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二十三辑

- 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的时候 金 丁
报海杂忆(上) 顾执中
北京解放初期的市政建设 曹言行 陈明绍等
我与金少山 翁偶虹
天 坛 单士元
北京典当业的内幕 高叔平
金壁辉其人 宪 均

北 京 出 版 社

110

59152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三辑

20031414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孙 史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29,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 11071.228

定价: 1.95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三辑

目 录

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的时候	金 丁 (1)
报海杂忆(上)	顾执中 (33)
回忆几个人和几件事	王芸生遗作 (96)
沈钧儒诗集《寥寥集》出版经过	沈叔羊 (107)
马叙伦和“六·三”索薪运动	马 燕 (111)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萧 劳 (116)
“扩大会议”前后的周震麟	周世贤 (121)
朱启铃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捐款	朱海北 (127)
北京解放初期的市政建设	
.....曹言行 陈明绍 贺翼张 温益友	(130)
北京解放初期的河湖整治与引水工程	郑裕崢 (138)
参加修建怀柔密云两水库的回忆	李肇祥 (144)
我与金少山	翁偶虹 (152)
路家班与北京影戏	翁偶虹 (186)
北京影戏	张次溪遗作 (201)

DK 65/02

北京典当业的内幕	高叔平 (205)
天坛	单士元 (257)
访袁崇焕墓庙	沈信夫 (269)
金壁辉其人	尧 均 (281)
金壁辉对戏剧界的敲诈勒索	李万春 (300)
捕鹰 驯鹰 放鹰	海洪涛 (304)
晾鹰台	李丙鑫 (320)
驼户和他们的婚俗	海洪涛 (324)

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的时候

金 丁

一九四〇年七月，在桂林，由胡愈之同志主持筹办的文化生活服务社终于新张开业了。他自己和所有赞助人无不感到兴奋非常，但就在这同一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的李克农同志对他说：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他必须立即离开桂林。而为了工作的需要，不宜去解放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掀起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酝酿也已接近成熟。为了贯彻党中央“荫蔽精干”的方针，而且要在海外华侨中开辟工作，飞机票已经通过李济深先生方面的朋友买好了。也可能还要有一些在国统区的同志到南洋去工作，愈之同志先去开路是恰当不过的。至于更详细的具体安排，可到香港后同廖承志同志进一步计议，如果一切进行得比较顺利，愈老的目的地将是新加坡，一个对他完全陌生的“狮岛”。

由桂林到香港后，愈老在香港大约停留四个月。

几乎和张楚琨同志(现任全国侨联顾问)离新加坡赴港同时，新加坡《南洋商报》馆里就有人透露，在人事方面不久会有新的变动。我曾从香港李少石同志的来信中，得悉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

时，曾提到希望我党能推荐有办报经验的知名人士到新加坡。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主持《南洋商报》的社长傅无闷先生对如何改进《南洋商报》，很有些新的设想和计划。但关键是要有位理想的办报的知名能手。据我所知决定请愈之同志到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的笔政，楚琨是起过作用的。

楚琨是我在三十年代初，当“上反”（上海反帝大同盟）决定由宋庆龄和杨杏佛等先生发起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工作时就认识的。一九三八年我到新加坡时，没想到《南洋商报》有影响的副刊《狮声》的编者是楚琨。他后来曾作为华侨新闻记者代表团成员回国访问。

由于楚琨的关系，我和《南洋商报》有过经常的联系，并被介绍到新加坡南洋女中教书。南洋女中的校长刘韵仙先生，是傅无闷的夫人。这位校长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有魄力，办学认真。有两件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一是一九三八年末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新加坡华侨教育界曾由她出面，领衔邀请了一些有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共同签名，发表了声讨宣言；二是根据南侨筹赈总会的规定，在抗战期间，凡华侨商店的店员、工厂工人以及学校的教职员每月都从工资中扣缴一定百分比的捐款，然后由南侨筹赈总会寄往重庆。但南洋女中的这笔捐款，到三九年还未上缴，刘校长通过南洋女中的刘道南老师（他是新加坡“民先”^①组织部负责人之一）探询我的意见，是否将这笔为数不小的捐款，买些医药用品（包括救伤车），直接捐献给八路军？我当时收到少石同志的回示是：“家中需钱急，衣物可不必寄。”我当即和道南

①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

先生去看刘校长，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战乱期间药品及救伤车恐怕不易收到，不妨把捐款径寄香港，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她同意了。结果是钱汇到了，八路军以香港办事处名义给刘校长并南洋女中全体教职员写了封热情的感谢信。这信和汇款单据，就在校长办公室外的布告栏内张贴公布，有人曾说这是南洋女中的创举。

楚琨到香港去请愈老到新加坡是顺利的。香港我党的同志也很有几个他的熟人。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楚琨是新加坡“民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民先”的工作有很多困难，既受英殖民地政府的压迫，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他曾和我谈起，很想和国内“民先”取得组织上的联系，问我到香港是否可以找到关系？我曾听说国内“民先”当时的一些情况，但也很不具体，后经少石同志同意，说是组织上欢迎他去。他到达香港，具体接待他的是连贯同志。他香港此行虽未接上“民先”的关系，但被安排参观了东江游击区，这对楚琨当然是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他也认识了我党在香港公开了身分的一些同志。

愈老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从香港动身的，他必须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到职视事，但办理护照手续既需时间，而且也会遇到意外麻烦。当时去新加坡如坐四等舱，不须护照即可登岸，但要在—叫做“旗章山”的小岛先受所谓体格检查（实际上是人身侮辱），有时竟至遭到几天的拘禁。因此，在愈老离港前，廖承志同志便通过一位英国医生，为愈老开了一张“体检”的证明。和愈老一起到新加坡的还有王纪元同志。据愈老说虽坐四等舱，但可到二等舱吃饭，楚琨的夫人就坐在二等舱随行照料。

愈老到新加坡后，《南洋商报》发表了一则该报聘请胡愈之先

生担任主笔并已到星(新加坡简称)的消息。这则消息惊动了当时英殖民地政府的华民政务司和政治部(亦即侦探部),因为他们对胡愈之在新加坡上岸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约了愈老去谈话。当时傅无闷想了一个办法,他要愈老印了一张《南洋商报》主笔胡学愚的名片。“愈之”只是他的字,按我国的习惯,字是尊称。所以报纸上发表为胡愈之,是极其自然的。对方也只落得个哑口无言。

愈之同志到新加坡还不过几天,国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新加坡和马来亚所能得到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少。路透社一月二十日的重庆电讯,只简单地提到“进攻新四军的消息,在此间外交界人士中造成失望”。而谈到苏联方面对这一事件的反响,则是一笔带过,即“有敏锐的感觉”。

在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地,《南洋商报》也还是个商业性很强的报纸,要使南洋广大华侨读者了解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对这次事变做出客观的评述,当然不大可能。但在一月十七日,《南洋商报》刊登了《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访问记,接着又发表了斯特朗的谈话,并于同日登出了胡愈之写的《团结则存,分裂必亡》的社论。这是一篇拨云见日,使读者感到《南洋商报》焕然一新的文章。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内战的可耻阴谋,把“千古奇冤”准确地做了报道,同时还指出:“我海外侨胞,其中最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抗战建国,是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社论的这种主张深得侨胞的同情与支持。

紧接着在一月二十五日,愈老又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从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文章特别指出:“英美对于中

国内部团结，表示极度关心，认为中国倘内部分裂，则日寇必将立即南侵，对英美极为不利。”而“美国还有同日本妥协的可能”。文章进一步讲到：“问题已不在于中国应不应团结，而在于怎样从这次事变的教训，寻求内部的根源。”

在事过四十余年的今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写评论文章的作者仍乐于称道愈老当时的文章“观察敏锐”，“分析深刻”，“在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局势中，经他条分缕析或旁敲侧击之后，常使读者顿觉视野宽广起来，看问题就清楚多了

《南洋商报》的声誉提高了，销路也随之而扩大。在这样的形势下，报纸的内容需要改进，要增加本报专电（原来电讯基本上来自几家外国通讯社，特别是路透社的较多），还要约些国内的专稿（过去祖国新闻基本上靠剪国内报纸拼凑而来），而愈老也需要有一些精干的助手。王纪元同志是同愈老一起进入《南洋商报》的，他专门编辑副刊《狮声》。不久刘尊祺同志来了，接着来到的是张企程和蔡馥生等同志，到沈兹九和王任叔到新加坡时，愈老所关心的则不只是一家《南洋商报》的问题，而是如何扩大在南洋的新闻战线的阵地。这时愈老住在中峇鲁，和我是近邻，我见他那一阵是很忙碌的。

新加坡华文报纸除了《南洋商报》，还有《星洲日报》和一家销路不大的《总汇报》。由于封建的帮派观念，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大多数是《南洋商报》的读者，而广东人多数是看《星洲日报》，尽管《星洲日报》的老板胡文虎并不是广东人。这两家报纸总的说来是对立的。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前后，俞颂华先生继关楚璞担任了《星洲日报》的主笔。他和愈老是旧交，早年在上海《时事新报》编

《学灯》，而《学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堡垒之一。后来由《时事新报》派往莫斯科做通讯员。他是和瞿秋白同志同去的。不久，他进了柏林大学，回国后曾在复旦、中公任教，然后进《东方杂志》，又主编过《申报月刊》。抗战期间，他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因教授与学员都须加入国民党，俞就毅然辞职来到新加坡。

不待说，颂华先生到《星洲日报》后，和在《南洋商报》工作的愈老合作得很好，两家报纸出现了融洽的气象。但不久，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从新加坡回国后，国民党决定用一切方法来打击陈嘉庚先生和南侨筹赈会，于是派了林藻民和潘公弼到新加坡接管《星洲日报》。颂华先生迫不得已脱离《星洲日报》去香港主持《光明报》。

俞先生在《星洲日报》时，新加坡的《总汇报》也很想从国内聘请一些新闻界的知名人士来主持笔政，愈老当时的意思是设法请郑森禹和乔冠华同志来，最后同报馆谈妥。但郑、乔到星之后，英殖民地政府突然借口乔冠华的笔名是乔木，而乔木则是延安有名的中共政论家，命令他们必须离境。《总汇报》不久也停刊了。

后来，邵宗汉同志到新加坡，进了檳城的《现代日报》。王任叔同志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侨师范任教。在皖南事变中幸存下来的沈兹九同志，也到新加坡，主要是协助愈之同志。杨骚同志也从重庆到星。他是闽南人，所以就到南侨筹赈总会的怡和轩去办《闽潮》杂志。比起我们这些来自上海的所谓“三江帮”，他自然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而且如我在《记郁达夫》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因为杨骚同志到星，大家和郁达夫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大约就在杨骚到星前后，生活书店也在新加坡办起了分店。

可以说这是一九四一年在新马华侨中开展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当然一切并非尽如人意。如刘思慕同志到星后，准备参加檳城《光华日报》的工作，并未成功，因而不远走爪哇。新马的群众组织中，也存在着侧重反英和强调反日的不同主张，虽说同属反帝，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时竟影响进步力量的团结。记得当时在愈老主编的《南洋商报》上，也出现过华侨民族属性与社会属性问题的论争。然而一九四一年，无论在国内和南洋以至全世界，都可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愈老写了《马来亚怎样帮助日本作战》的社论。日寇当时所用的铁砂，有百分之五十（约六十七万三千吨），是从马来亚运去的。社论对此提出严重的警告：“要知道少运一磅铁砂或锡、米给日寇，就是使马来亚少流一滴血，而效果已经是不久就可以看到了。”

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到二十八日两周内，愈老就写了六篇《论保卫南洋》^①的社论。社论指出：南洋是一千多万华侨的第二故乡，而“战争是在一天天扩大着，蔓延着”，“南洋直接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回想当时我还不曾意识到战火就要烧到身边，甚至日本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并轰炸新加坡，我也还不曾明确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久已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① 二月十四日《论保卫南洋——战争是不是还能够避免》，二月十五日《再论保卫南洋——怎样避免战争的来到》，二月十七日《三论保卫南洋——保卫南洋与保卫祖国》，二月十八日《四论保卫南洋——英美合作问题》，二月二十七日《五论保卫南洋——英美荷对日禁运问题》，二月二十八日《六论保卫南洋——战争与民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星期六。我这一天没有课，下午赶到报馆送了篇稿子，也不曾听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消息。人们象往常一样闲散地度着周末。但就在午夜过后，突然有飞机轰炸了市区。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不安地期待着天明之后的消息。到第二天，日军在北马哥打峇鲁登陆的消息证实了。大战爆发了。这突然的袭击，使人们感到惊慌失措。很多人抢购罐头、粮食。店铺照常营业，公务人员也照常上班，只是学校停课了。我们都不曾料到日军占领整个马来亚是那么“神速”，只用了五十三天。大英帝国以拥有坚不可摧的要塞新加坡而自诩，但战争开始不到一周，镇守新加坡的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击退号”竟被日军击沉。在吉隆坡快要失守的前夕，新加坡华侨新闻界人士曾邀请殖民地政府情报部的官员，要他们说明一下战争的真实情况。回答是他们准备采用在吉隆坡以南什么地方以所谓“袋形的战术”，也就是说日军不久将全部落入英军的“袋”里被消灭。事实证明这是欺人之谈。到一月底，柔佛海峡大桥已被英军自己炸毁；在陈嘉庚先生约见新加坡总督汤姆斯之前，英军已经决定投降了。

愈老是在二月四日与郁达夫、邵宗汉、王纪元、张楚琨、蔡馥生，还有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和我的一家四口(包括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一起从新加坡撤离的。

兹九同志与女儿绿绮和楚琨的夫人、女儿是前一天出发的。杨骚、张企程、吴柳斯和郑楚耘是乘船于九日离开的。

当时，新加坡的海面已经完全封锁，敌机不断地轰炸。如果不是楚琨设法找到了一只摩托舢板小船，可能我们撤离的日子还

要推迟。

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无论是组织抗敌动员总会和战时工作团以至青训班，和往常一样，愈老都是我们这些人中的核心。和他熟悉的人，常常感到他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觉得和他在一起，就会更有办法，更有信心。他虽然主要是负责领导抗敌动员总会的宣传工作，但大家都感到一切事离不开他，须和他一起共同策划计议。即以我们非撤离新加坡不可的这个问题，也是经过不只一次的酝酿，而最后到他家里才决定下来的。

我们离开新加坡时，被巡逻的警察发觉。他们拦住了我们到码头去的汽车，找了各样的借口刁难。直到宗汉、楚琨和我的爱人带着两个孩子到警察局交涉之后，才放行。

我们最初的目的地，是通过马六甲海峡，到当时荷属的石叻班让(Selat Pandjang“长港”之意)。这是一条近路，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到达。然而在经过峇来吉里汶岛时，我们的小舢板竟被误认为是日军登陆艇；最初我们甚至不知道岛上响起的枪声，目标就是射向我们。等到那些“仓惶应战”的荷兰人和土著警察，望到我们这小船上有老幼妇孺，才停止了射击。我们也总算上了岸。几经交涉，我们仍在那里被扣留了两天。

我们在石叻班让受到当地华侨的热情款待和照顾。石叻班让尽管是个偏僻的小港口，继我们从新加坡逃往这里的人却逐渐多起来。为避免暴露身分，愈老提出：我们必须疏散，化整为零。

他和郁达夫、王纪元、邵宗汉及兹九母女，准备拿到当地荷兰殖民官的签证，然后径去爪哇。但荷兰人诡称要到望加丽岛，找分州长去办手续，结果是愈老等人不得不去望加丽岛。到达那里时，分州长已经因新加坡陷落而逃掉。所以这时也就无所谓签

证之可言，但问题是这里已没有往来爪哇的船只。有位经营电船公司的陈仲培先生，非常热情地挽留愈老他们暂住到附近叫做包东的山笆里。结果是他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一个半月。

对于“山笆”这个词的涵义，我过去一直是一知半解，它甚至不象是印尼人所说的 *Kampung* (即村落)。我不曾到过包东，但我在苏门答腊住过的几处山笆大体都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和任叔夫妇、杨骚住过的亚莱，甚至只有两户华侨，印尼人几乎少见。从我们住的山笆走出来，至少要五六个小时。山笆里有成群的猴子、野猪、毒蛇和一些叫声奇特的飞禽。每到夜晚更显得荒寂。当地人曾嘱我们绝对不能吃井水，会生病；因而经常饮用那些小河沟里的浸透着腐烂树叶的红水。我们储存雨水做为最佳饮水。

人迹罕至的地方，便于隐居。但对于我们这些不会讲闽粤方言和印尼话的上海人来说，生活上就显得特别困难，只能是到处过“扪帮”的生活，即诸事“借光”于人。郁达夫的遗诗里曾有“乱世桃源非乐土”的感慨，他是最先离开那“乐土”包东的。纪元继达夫之后到了彭莪岭。宗汉则根据愈老意见，到石叻班让附近的小岛上，和那里的难友们取得联系。而愈老和兹九、绿绮也离开了包东，暂住泻港一处亚答屋（即用棕榈叶片盖成屋顶，四壁用席子搭起来的小房子），开始“独立门户”。

在这期间，他们自学起印尼语文来。记得在我遇到的印尼华侨中，几乎都认为我们学习印尼语文是“多此一举”。住在那里的华侨世代和印尼人一起生活来往，以至做生意，但他们从未学过印尼语文，一样地可以说印尼话。其实那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印尼语”，是根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形成的。由于民族的偏见，华侨

看不起印尼人。因而在发觉愈老和兹九同志学着印尼语文，在那样小地方的华侨当中，便传说他们很可能是日本人了。待到弄清他们是什么“写书写报”的华人，并非是做生意的，就又怀疑起他们会不会是日本人要捕捉的危险人物。流言增加了愈老他们的不安，接着又有印尼警察到他们住处来盘查。他们已经不便再住下去。大约是在盘查后的第三天，他们便前往北干峇鲁（Pekan Baru）了。

北干峇鲁是位于苏门答腊东海岸上的港口。愈老的看法是，到了苏岛大陆之后，我们这些流亡者可以活动的地方就广阔得多了。它几乎比荷兰本土大十六倍，南经巨港，可渡海去爪哇，西去巴东直达印度洋畔，东北则有棉兰和通往安达曼海的亚齐。我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到北干峇鲁的，由于当地许聪耳先生的协助，当日便买好了到巴爷公务（Paja Kumbuh）的汽车票。途经万金能时，旅客们都要下车吃饭，休息。我有幸在这里看到赤道的界碑，阳光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异常灼热。车往西走，地势渐高，气候也显得愈加凉爽，到达巴爷公务的时候，已是万家灯火了。在经过八个月的山笆隐居生活之后，突然到了陌生的热闹市镇，我不禁感到惶惑和不安。战争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还不知道在敌占区里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遭遇，好在有愈老和兹九同志等在那里，我将会得到更多锻炼的机会。

长途汽车就在巴爷公务的海天旅馆附近停车，那里是终点站。据郁达夫说，“海天”是他在苏西^①的发祥地。我在那里吃过晚饭，就问起那位海南人老板，经营甘密（Gam bir）土产的头家李锡树

① 苏门答腊西部，是个行政区。

家在哪里。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也许觉得我完全不象是个生意人吧，不过他还是用手向窗外指了指：“那，就在对面。”

找到了李家，把李老先生的女婿董光斯的介绍信交给了他。董光斯一九三二年是我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我之能在亚莱隐居，得力于他的照顾不少。李老夫妇很关心光斯和他们女儿的情况，问长问短，对我也象对亲人一样。后来李先生和几个儿子问起我是否和赵廉（即郁达夫）先生很熟，我说是一起在新加坡陷落前出来的。李先生伸了伸大拇指，说道：“赵先生可是个好人，现在华侨的生意要比印尼人难做，这里现在是印尼人说了算，没有赵先生，我们有谁能和日本人说上话呢？”

第二天一大早，楚琨就来李家找我，领我先到达夫的家。那是一所坐落在一条幽静街道上的荷兰式房子，路旁种着梧桐树。我没想到出来开门的却是王任叔同志。老王和雷问予同志是在我离开亚莱半个月后才离开那里的，但他们反而先到了巴爷公务，现在是以佣人身分暂住达夫家。小雷是山西人，见到我来，说昨天刚好买到猪肉，一定要请我一起吃饺子。任叔说达夫要一两天后才回来，说他们自己可能不久要离开巴爷公务了，想到苏东棉兰一带做些工作。任叔也谈起同达夫意见的分歧。我感到对于“不该消极逃难”的说法，达夫一下子会听不进去或接受不了。据说达夫直接了当地讲起：“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安全地生活下去。”我到巴爷公务后和达夫第一次见面时，他也说起住到这里安全是没问题的，“老金（指愈之同志，当时愈之化名金子仙）他们住在这里不是满好吗？”见到任叔后的当天下午，我去看愈老和兹九同志，他们住在离市场（Passar）区约有半小时路程的拉布西朗（Labah Silang）。这里的房主人是住在有名的 Ruma Batu（即砖瓦房）的